

2020 岁末感怀

□力 耕

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,我有幸走访了两所小学,突然心底有了某种触动。

这两所小学没有名校的光环,名不见经传,一所是位于三县交界的偏僻乡村学校,一所是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新居民子女学校。

我所说的触动并非以往那种常见的、面对弱势群体时居高临下的同情,或对坚守和奉献者宗教般的敬仰,也不是那种弹着西班牙吉他、念诵清代冷门小诗、实质上是带有表演性的煽情自伤。

在2020年的时代大背景下,很多既有观念被颠覆了。我想找一个普通的词切入,让读者也能理解我的那份触动,那就是——“网红”。

网红的形成模式不同于明星,它是大数据背景下的产物,取决于关注人数的海量。它很难用商业模式炒作出来,红了就红了,不红再怎么用力也不红,这显示出互联网舆论的公正性。

回顾一下,如果说2019年的网红是美食视频UP主李子柒;那么,每天骑马牧牛的纯正康巴青年丁真,作为2020年的网红应该没人有意见。

你能看出李子柒和丁真的共同点吗?

如果确定不了,不妨再来看一位网红的官员。原先有很多政府官员为本地产品代言,为什么只有身披红斗篷、雪地策骏马的副县长贺娇龙红了?

最后再请看咱们教育界,浙江乃至全国网红的小学是哪一所?

我用这个问题试过好多人,得到的答案甚为一致,且几乎都是脱口而出——富文乡中心小学。

这是一所位于千岛湖畔的小学,如童话、如仙境、如梦幻……在今年取得28亿元票房成绩的国庆档电影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中亮相。无论名校再怎么有名、知名、著名,哪一所有它红?

对啊,这些博主、少年、官员、学校网红的共同点是——来自乡村。

曾几何时,拜金主义、流量明星还在霸屏,不知怎么,转眼之间,都市的文化优势正逐步丧失,乡村、田园、土味让人爱了起来。

时过境迁,如今的逻辑竟然是:城里的红不过村里的。

这真是太励志、太正能量了。

在这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,中国经历了很多,人类经历了很多。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,很多事情都演化成了魔幻现实主义,认知方式在改变,既有价值有待重估,可谓百年未有之变局。

回到文章开头,我在这两所学校到底看见了什么呢?

我在这所乡村小学所在的村镇,看见了清澈的溪流、连绵的远山、金黄的银杏……

当然,你可以说这些都很正常,农村就是这样靠山吃山嘛。

可是,我还看到了其他的東西,一些过去没有的东西:藏品众多的非遗文化博物馆、复古还原的抗日事迹旧址、功能齐全的村民会议中心,还有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民家宅院,最后是经过专业艺术规划的充满设计感的整个村落布局与外观。

而在这所新居民子女小学,我且不说它的占地规模、场馆建筑、体育设施、停车空间、信息设备(光凭这些足令不少硬件条件局促的城区学校嘴里发酸),我也看到了其他的東西,一些城区学校没有的东西:该校开设的十几门走班课程,包括竹筒制作、本地方言、地方戏曲、花式跳绳、废布剪贴画、产品工艺流程等,这些课程丰富、生动、拓展、成熟,城区学校能开出并经营好其中的一门,在我看来难度系数都非常高,都值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。

尤其是学校为来宾准备的一台学生文艺演出异彩纷呈。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舞蹈、十几种地方戏的演唱的“串串烧”,将舞台装点得多彩、欢腾、喜庆,让人几疑新春佳节提前来到。

欣喜之余,我有了一种预感或者说是猜测:所谓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态势,似乎正在或已经出现反转。至少乡村或城郊学校的课程资源,尤其是研究性、拓展性校本课程资源,在数量与质量上迟早会对城区学校形成反超。

首先,一些“规定动作”所需资源已不存在城乡差异。由于互联网科技的普及,在“世界变平”的大趋势下,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、各种民营的教育资源平台,免费或付费的教材、课件、图书、电影、音频等信息资源瞬间可得。

“我们农村小地方。”“你们城里来的

人,见多识广。”这类日常对白已只能是纯粹客套。

只要插上网线打开Wi-Fi,只要信号能覆盖的地方、快递小哥能到的地方,就不能从地理上区分城市还是乡村,因为所有人获得信息和物流资源的机会和时间几乎一样。

其次,在拓展性课程资源方面,反而是乡村和城郊学校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。我走访的这两所小学就是如此。

这所乡村学校不仅适于开展自然科学教育、劳动实践教育课程,而且周边还有很多优质企业,包括数字型企业。它们不仅在学校提供生源,同时也在提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工业劳动实践教育资源。

而在这所新居民子女学校,在林立的工厂环绕中,也并没有完全城镇化。从教学楼望出去,可以看到学校毗连着大片的阡陌农田,纵横的河道与树林,一部分居民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。

走进自然,走进车间,走进民间,对于这两所小学的学生,可谓是一抬脚的事。

而城区学校与之相比,远离农田与工厂,是明显的地理劣势。一学期组织一两 次工农业社会实践活动,已是劳师动众,路远费巨,效果则如蜻蜓点水,走马观花,相关的自主研究课程很难深入与持续开展。

最后,不可忽视的还有德育中的精神资源,如勤劳、节俭、质朴、坚韧、创新……这些精神内核在许多城区家庭中已然失去。

社会经济发展壮大了城市中产阶层,使他们有了更多可支配的金钱与闲暇。但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,金钱与闲暇也能够滋生好逸恶劳、沉溺享乐等不良习惯。家长自己不劳动、不学习,却要求孩子努力奋斗,言传身教模式崩盘,家庭教育威信尽失。

而这些品质对于务工务农者却是赖以 为生的基础,子女们仍能从父母身上看到并学到不少。

城市,一直是文明、先进、富裕、开放的代名词,但随着城市区域功能的单一化,物价高企、住房紧张、交通拥堵、空气污 染、竞争激烈、人情淡漠等“城市病”削弱了城市的吸引力。

城市中的教育的内卷化越演越烈,城市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普遍焦虑,学生每天忙于当一个“做题家”,课余时间又奔波于各

培训机构。

狭窄的生活空间、繁重的学业压力,导致师生关系、亲子关系恶化,学生心理病症频发,漠视生命的极端个案也逐年增加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自2014年达到峰值后,已经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,城市至少减少了1700万人 口。

反观乡村这些年,无论是政策层面,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“乡村振兴”“山海协作工程”,还是从乡村发源走向全国的“两山”理论、美丽乡村建设;无论是现实层面,年轻人逃离“北上广”、逃离大城市的被动无奈,还是大学生争夺公务员选调生名额、小有所成之士返乡乡里的主动回归,乡村愈加清晰地展现她新的面容。

原有的一些标签,如贫穷、愚昧、闭塞、匮乏、荒蛮、落后、可怜……已不再适合指称乡村,而人们更愿意赋予乡村更多美好的意义:美丽、宁静、典雅、古朴、舒适、干 净、亲切、富足……

双休日、节假日,城里人开着私家车往城外跑,哪里 有山清水秀,哪里 有高端民宿,哪里 有山肴野馐,哪里 有未被学而思和奥数污染的眼睛,哪里 就是一个正常人心之所往,足之所至的所在。

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曾经为工业现代化奉献“剪刀差”,曾经吸纳过城市过剩的产能和人口,曾经为“世界工厂”付出过价格低廉的劳动力,而随着疫情防控胜利后新一轮经济腾飞,新居民们正不停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加班加点……

他们有权利享受居住地的教育反哺,而在实体经济的劳动力争夺大战中,每一个人都有“用脚投票”的自由,这不仅取决于企业工作环境,也取决于教育回馈的质量。因此,乡村学校和城郊学校的一线教师,也有着振兴本地经济的重要责任,在“拼出来干出来”的中华复兴之路上,理应建立足够的职业自信,继续盘活区域课程资源,陪伴学生,维护学生,发展学生,为学生家长解除后顾之忧。

2020年的惊喜已如常,2021年,拭目以待,干就完了!



俞和军(楼主)

在教育系统正式的文件中,除了期中考和期末考外,中小学阶段不允许组织统一命题的考试。然而实际情况是,阶段性检测(月考、独立作业、模拟考等)往往以几校联考的形式依然存在。请您谈谈认识。

龙泉许东宝

月月考,考倒了老师,考累了学生。学生的学习是要以分数来体现的,但学习和分数完全等价的话,则是教育的悲哀。那么,如何获得分数才是正确的呢?应该是在教师的引导和辅助下,让学生掌握方法,培养思维,升华情感,轻负担、高效率地获取分数,而不是用一张张试卷,机械地笨拙地压榨式地获取分数。

伊 人

阶段性检测应该且有必要实行,教师可以通过阶段性检测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,在保证不排名、不外传的前提下,作为调整教学进度和难度的依据。但月考等统一检测往往会浪费时间,打乱教师的教学计划,加重教师的负担。

阿 国

就像小学单元测试,月考也不是洪水猛兽。所谓的弱化日常考试,虽说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,但如果一直不考,学生得不到自我评估。因此,在符合教育规律、尊重学生的前提下,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日常阶段性测试,有助于教师、家长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更多层面的帮扶和引导。

吴笔建

月考与政策相悖,却早已成为学校的标配。

因其对教学质量的监控有一定的作用,引得大家乐此不疲。当然对学生而言,学习压力更大了。

赵占云

学生、教师、家长应该正视考试,看清阶段性检测的出发点,是得到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反馈,以及用检测结果指导下 一阶段的查漏补缺,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质量。如果把这一次次检测视为核定学生个人优劣的唯一标准,就营造了以分数论英雄的氛围。

人人怕考试,谈考试色变,这种恐惧慢慢从学校蔓延到家庭、社会,家长也跟着紧张。学校有正确的考试观,就能把好学生发展的方向盘,让学生在检测后都能够有所得,从而补齐不足,更好地应对挑战。

翊 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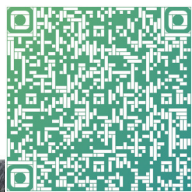
教师为了每一次考试积极合作,轮流出题,参与监考、集体阅卷和考后评卷,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。一学期两次大考,加上月考,是不小的工作量。学校管理者担负着提升办学质量的重任,当然希望掌握更多师生教与学的情况,而月考数据为此提供了一定的依据。

但月考带给学生的“收益”到底几何,没有人计算过。以前的学校没有月考,教育质量也未必不佳。

对于月考,家长褒贬不一,优秀学生的家长不反对月考,因为孩子的成绩会带给他们快乐与放心,而其他家长是有些怕的,怕考后教师约谈自己,怕月考成绩在微信群公开,因此每一次月考都会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。

月考不是任何时候都完全不受欢迎的,月考的受欢迎程度随年段上升。我们学校初一不进行月考,初二开始,很多学生希望能考一下,看看距离心仪的学校还有多大的努力空间。到了初三,随着中考临近,学生都跳进“战壕”里了,考试再多也不会违反,直至中考那天到来。

此话题可继续讨论——



教师话坊

三色刻度尺

□绍兴市元培小学 骆海燕

“每一食,便念稼穡之艰难。”自古以来,中华民族对粮食心存敬畏。而如今餐桌上的浪费现象却比比皆是,令人心痛。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,在全社会营造节约光荣、浪费可耻的氛围,有必要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节约粮食的习惯,引导学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,向“舌尖上的浪费”说不。

我校连续两个学期以“我光盘,我光荣”为主题,在全体学生中开展“光盘行动”,倡导每个学生争做“光盘小使者”“光盘宣传员”“光盘监督员”,努力做到不挑食、不剩食。

我校“光盘行动”的亮点是三色刻度尺,这是巧借交通信号灯的“红黄绿”三色,控制学生午餐浪费情况的一个办法。

每班在纸条上依序画好红黄绿三条色块,再将纸条贴在用来倾倒食物残渣的塑料桶内壁上,以提醒学生注意粮食浪费的程度。当桶内残渣水平线在绿色块内时,表示“光盘”践行情况良好,该班应该表扬;残渣到达黄色块,则表示未能达标,需要该班引起重视;如果残渣已触及红色块,实际上不可能产生那么多残渣,表示这里面以剩菜剩饭居多。

每天中午,学生用餐结束后,党员先锋岗5位教师担任“丈量员”,按照“绿色2分、黄色1分、红色不得分”的评分标准,为全校30个班的“光盘行动”亮分。一周下来,全校得分最高的几个班级获得在表扬栏中公示的荣誉,并享受周一每人获得一份水果或小点心的奖励。

未达标班级的师生及相关人员需要反思并进行整改:班主任自查“光盘教育”是否落实,管餐教师自查管理是否到位,每一个学生自查是否认真践行“光盘”,食堂后勤人员自查菜肴搭配是否科学、口味是否学生喜欢。



第305招



关注细节

肩扛手提上幼儿园的,不是家长而是小朋友

□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中心幼儿园 吴 波

这是后疫情时代,幼儿园实施封闭式管理,问题来了:“怎么把寝具搬进教室?”这个问题引发了家长的质疑:

“哎哟,老师啊,我们家孩子不行,她拎不动这被子的。”

“囡囡,来,外婆帮你拎,你力气小,肯定拎不动的。”

“算了,宝贝,你拎不动就放在那里好了,老师会来拎的。”

……

教师拎起寝具,递给一名幼儿说:“你试试,没问题的,我相信你。”

马上遭到家长抱怨:“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?这么重的东西,怎么能让孩子拎?”……

“自己的寝具自己拎,还是让别人拎?”这是一个好问题,家长偏向于不让孩子自己拎,主要原因不外乎担心寝具太重,幼儿拎不动,以及上下楼梯不安全。

但是,幼儿园教师一直主张幼儿

“自己的事自己做”,大人不包办代替、不剥夺幼儿自主学习的机会。

于是,我们根据PBL(Problem-Based Learning)教学法,简单来说就是用问题式学习进行管理,让幼儿经历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尝试用各种办法解决问题的过程。

教师们进行了头脑风暴,想到了各种办法,比如对时间进行分解,让幼儿两周拎一次;或者将重量进行分解,让幼儿每周拎一部分。

幼儿园曾统一配发过一个粉色袋子,当初是用来装所有寝具的,体积比较庞大,幼儿携行不方便,建议换成小袋子。

教师再让幼儿进行集体讨论,幼儿也发现袋子太大的问题。

此外,幼儿也想出了很多好办法:有的幼儿觉得多吃点饭就可以更有力量,体现出童真的思维;有的幼儿觉得可以互相帮忙,比如两人一起拎袋子;有的幼儿认为上楼的时候扶着栏杆更安全。

教师让幼儿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做计划,选择一个方案:是一次性都拎走,还是分成两批,每周拎一部分?

在助力幼儿自主搬运寝具的过程中,家长也贡献了智慧:有的为幼儿准备了合适的小袋子,有的将棉被叠得很平整,还有的将东西分装成两袋,让幼儿肩上背一袋,手上拎一袋。

“自己拎VS别人拎”是一个小问题,却是一个全员参与、多方协同的问题解决过程,也是一门提升幼儿自理、自立能力的绝佳课程。在搬运寝具的过程中,幼儿自己计划、实践、反思,发现并解决一个个问题,从生活中获得成就感,逐步养成积极的态度。

这样的实践教育比语言更有说服力。今后幼儿面对类似问题时,不会害怕、逃避,而是会主动学习、勇敢突破,寻求解决之道。

在这一事件中,教师和家长也获得了成长。我们从原来的担忧到敢于逐步放手,善于共同探究,帮助幼儿,不断见证儿童的力量,成为儿童发展的同行者。